



施建生專欄



熊彼德青年時代的學術成就

施建生



熊彼德(Joseph.A.Schumpeter)於撰寫一些學人的傳記中，常常強調在一個學者的生命中，最關重要的是他的第三個十年。因為他認為一個學人如能在理論上有所貢獻，則其基本的架構就是在這一期間完成，自此以後都不過是將這些架構加以發揮或修正而已。所以他稱這是「創作活力旺盛的神聖的十年」(sacred decade of fertility)。我們也許不接受他這種論斷，但就他自己的情形論則確是如此。他在這一時期不但寫出了許多重要的論文，而且還出版了三部主要著作。這就是在1908年出版的「理論經濟學的性質與要義」(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1911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1914年出版的「經濟學說與方法：一個歷史的素描」(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An Historical Sketch)。他在後期所寫的鉅著可以說都是從這些早期的著作中發揮出來的。現在我們可以簡略地將他這三部著作的要旨加以說明，以示其在青年時期之學術成就的輝煌。

先以「理論經濟學的性質與要義」

論，這是一部以理論經濟學或稱純粹經濟學(pure economics)為中心討論經濟研究方法論的書，它的目的是想將理論經濟學所涵蓋的領域加以素描。其中大部分的內容都已見於他人的著作，熊彼德之所以要再加論述是鑑於德國學界對於經濟理論一向陌生。而德國學界之所以會有此現象，則由於其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歷史學派對之一直予以忽視，尤其是在1880年代經過一場與孟格(Menger)思想熱烈辯論的所謂「研究方法論戰」(Methododerstreit)以後，這種情形更為如此。熊彼德認為這是一種不很健康的現象，所以他想通過自己的禿筆對之有所補正。

他曾先就指出理論經濟學是一種科學，對於政治應採取中立。他在該書的序文中就明白表示：「我對於實際政治沒有興趣，我唯一的企业是知識。」這種言詞就不時在全書中出現。同時他也堅決反對從經濟學理中引申出政治的論斷。他認為古典經濟學家將完全競爭視為一種理想，就已超越他們的學科的界限。實際上，競爭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並無其他涵義。再如經濟分析上的所謂個人主義只是說我們

術成就

在從事經濟分析時須從個人的行為入手，不應從團體或一般社會入手。這就是他所謂的「研究方法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但不能由而認為個人主義是一種政治的價值，這是「政治上的個人主義」(political individualism)。實際上，從經濟理論中是不可能引申出支持或反對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的。

接著熊彼德就討論經濟理論與歷史的關係。他認為不論是歷史研究還是經濟理論都須從具體的事實入手去進行，不能以先驗的假設來替代實情。但是實際情形是很繁雜的，要想將這種繁雜情形的全貌都加以描述是不可能的，不論是歷史學家還是經濟學家都須從中選擇自己所感興趣的事象，然後集中全力去研究。但從此以後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就要分道揚鑣了，因為前者所想求出的是實際情況中之個別事態的真相，而後者則要想對有關事實的一般情況有所體識。這時經濟學家就須進而提出一些假設，俾能對現象的本質有所掌握。而要提出假設就須對於現象中某些情況予以隔離，而將之抽象化。這對於一般沒有受過訓練的人看來，也許會認為這樣所提出的已很少是實情了。但實際上則不是如此，經濟學家經過這種手法所提出的正就是實情的容貌。它當然不會與實情完全一致，但它卻已將其要點表露無遺了。

經過以上這種說明後，我們當可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在熊彼德的心目中，理論經濟學與歷史是很少相同的，二者基本是二種不同的活動。不但如此，在熊彼德看來，理論經濟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也是這樣，彼此之間很少相關。既然如此，理論經濟學所研究的究竟是什麼呢？他認為它所討論的領域是非常狹隘，但很重要。這一領域就是人的行為。他認為理論經濟學將成為第一種真正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為了說明人在經濟社會中的行為，他提出了一個模型，這就是華爾拉(Leon Walras)首先創立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他利用這一模型描述社會中表達各人行為的經濟數量是相互密切關聯的，變動其中之一就引起所有其他數量亦隨而變動。這些變動到了全部靜止時，也就到達了一般均衡或稱全面均衡的局勢。經濟學家的任務就在說明其中一種變動，如